

代的官僚構造，草率地建立在敗戰前日本固有的戰時官僚制度之上，在1952年之後被日本人精明地延續下來，以守護他們新的資本主義。」（頁531）在美國的考量中，推動亞洲的現代化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同時進行的，這個進程在1950年代初期開始轉變為冷戰體制，而到1970年代才開始對中國有所緩解，於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權威政治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中心的「民主政治」發生了衝突。日本戰後形成的官僚體制與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官僚體制是一對目的相反而結構相同的孿生子。

作者基於戰後日本重建的經驗，在結語中寫道：「事實表明，一個國家不必繼承儒家文化，就能推行獨裁政治、權威崇拜、和合第一、輿論一致以及自我束縛。」（頁549）如今，東亞的權威主義官僚政治面臨全球經濟危機的挑戰，要克服這一危機就需要改革官僚政治，這需要東亞不同地域的人民利用各自地緣政治的優勢，攜起手來共同打造東亞道德共同體。關鍵之處是要重建儒家的政治倫理，而天皇制民主的遺產將在未來的東亞民主秩序願景下得到新的繼承與發揚。

回憶與沉思 ——情緒性體驗的反抗姿態

● 陳鄭雙



陳家琪：《三十年間有與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陳家琪先生2008年在《新京報》的專欄上，刊發了以「三十年間有與無」為題的系列文章，讀者反響強烈。後集結成《三十年間有與無》（以下簡稱《三十年》），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於2009年初出版發行。陳先生贈筆者一冊，筆者讀後寫信評論說，這本回憶錄實在是精彩。陳先生回信道：「謝謝你的讚賞，

陳家琪的《三十年間有與無》以多年日記為底本，配着許多珍貴照片，其內容主要是談論三十年間發生的家國大事，怎麼會是本哲學書呢？

此書的基本訴求是通過還原記憶中的意識現象，以個性化的記憶抵制遺忘。這說明本書的內容不是簡單的事件堆積，而是有意識的意識現象的還原。這種意識現象即是當時的某種情緒性感受。

我其實是在寫一本哲學書。」陳先生的回信讓筆者感覺有些詫異——這本書以多年日記為底本，配着許多珍貴照片，其內容主要是談論三十年間發生的家國大事，怎麼會是本哲學書呢？於是筆者重新閱讀了此書以及陳先生之前出版的書籍，這才慢慢理出了一個頭緒。

我們首先看陳先生自己的評述，他說：「無論是事件還是精神，哪怕就發生在眼前，大家也不會有一個共同的認可，甚至就連這件事是否『真的發生了』也會眾說紛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記錄過去？也許只能以散文的方式在記憶中描述自己的意識現象。」「也許只有當時的某種情緒性的感受才最真切，因為我相信我所記述的只是我個人的歷史——最好是能折射出時代中某種普遍性的東西，這就需要某種對歷史的理解與解釋。」然而，「生活中有更多的東西是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的。」「三十年間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很難用幾個統一的概念加以規定，但冷靜，旁觀，多少有些悲切的感受，以個人化或個性化的記憶抵制遺忘，從而使人們對歷史以及歷史的敘事方式有新的體會。這就是我對我們這個時代中的個人經歷的回憶與思索。」（封底）

這便是此書的基本訴求：通過還原記憶中的意識現象，以個性化的記憶抵制遺忘。這說明本書的內容不是簡單的事件堆積，而是有意識的意識現象的還原。陳先生認為這種意識現象即是當時的某種情緒

性感受。由此出發，我們可以推出兩個問題：其一，為甚麼要通過回憶去還原當時的情緒性感受？從整整三十年的事件所還原出來的，肯定不是某一時某一刻的情緒性感受，而是一個情緒性感受的整體。為甚麼要還原出這樣一個情緒性感受的整體呢？其二，為甚麼要用記憶抵制遺忘？這是甚麼樣的遺忘？還原出情緒性感受的整體與抵制遺忘有甚麼關係？

《三十年》中記載了1983年發生的一件事，這件事情極具戲劇性，也很有黑色幽默的意味：陳先生的一位朋友，既是同學又兼同事，「寫了一些關於馬克思的文章，討論了異化，人道主義的問題，使用了據說是犯了原則性錯誤的一個說法：『林彪、四人幫搞的是假社會主義』（當時『主流』的說法應該說成是『林彪、四人幫反社會主義』）」，「而『發現』並指出這一點的，在發言中慷慨陳詞，羅列出一、二、三、四點要害，並真正顯得義憤填膺的老師們，自己都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大的罪。」（頁27）之後事情愈鬧愈大，正趕上「清污」運動，最後要在全所（哲學所）開大會，批判這位朋友，不想陳先生事先做了準備，「在《鄧小平文選》中發現鄧小平也多次使用了『林彪、四人幫』的假社會主義這樣的說法。」因此，當日他就在大會上，「聲淚俱下地痛陳事情（也就是「異化」和「人道主義」這兩個概念）的原委，翻出鄧小平的話，引用馬克思的話，怒斥……這場莫名其妙

的整人運動」(頁29)。後來事情不了了之，「清污」運動沒有繼續搞下去，因為「鄧小平只是說了『不要搞精神污染』，並沒有說『要清除精神污染』。又是一字之差」。陳先生在書中感慨道：「苦樂人生，苦笑人生，這一切，讓中國人怎麼可能不『惡搞』？」(頁30)

這其中的情緒，除去苦笑外，恐怕就是驚訝。為甚麼那些剛剛從苦難中脫身出來的人，又成為苦難的製造者？為甚麼一字之差會有如此大的變化？為甚麼事情發生了變化，而語言還是原封不動？

這件事發生後過了大概五六年，陳先生出版了隨感錄《人生天地間》(以下簡稱《人生》)。這本書在開篇即討論「句型」問題。這是從魯迅的《阿Q正傳》中引出的，說的是阿Q要被遊街殺頭，「他不過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要示眾罷了。」「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便是一個句型，有了這樣一個句型，甚麼內容都可以隨便往裏面加。「未免我總算被兒子打了、未免要摸小尼姑的頭，對吳媽說：我要和你困覺、未免抓進抓出，在紙上畫圈圈，而又畫不圓」，因此「問題不在句子的內容，而在句子的形式」。「真理是判斷，判斷是句子，而句型就是高度抽象化了的句子。」(陳家琪：《人生天地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3。)這也就是說，這個句型就代表了某種「真理」。「句型確定了一種心態。」句型不變，所謂的「真理」就不會

變。[『文革』過去了，但『文革』式語言(句型、形式、結構、邏輯、甚至語氣、態勢)卻演化成各種備用的理論形態存留在腦海中，無論甚麼情況下，只要你想說明自己的觀點，這些備用的模式就會一擁而上，結果不是你如何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之新，而是你自己的新如何證明了舊有模式的無所不能。](《人生》，頁16)

如果句型有如此巨大的效應，那麼任何新的理論都有可能只是「新瓶裝舊酒」。它看上去是在談新的東西，實際上還是舊的一套。新的理論要獲得真正的意義，首先就必須清理固定的語言與句型。這項工作需要通過回憶來進行。只有通過回憶還原情緒性的體驗，在這種體驗之中直觀到這種舊「句型」，我們才能對舊的思想內容有所防備，在這種基礎上才能談論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把「句型」問題放大看，就是一個文化系統的問題。「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大都是從政不行，才當隱士，當不成隱士或不想當隱士了才造反，一造反就又有『新舊之爭、旗漢之爭、英俄之爭』的輝煌外表。這樣一種格局一延續就是幾千年，『文化』二字雖說講的是以『文』化『質』，以『人文』化『自然』，但實際上從事文化的人又始終走不出修、齊、治、平的老路循環。」真正給予這樣一種文化理論致命打擊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和十月革命的實踐」。「然而，經過了許多年，我們似乎又失去了理論基礎，

任何新的理論都有可能只是「新瓶裝舊酒」。它看上去是在談新的東西，實際上還是舊的一套。新的理論要獲得真正的意義，就必須清理固定的語言與句型。這項工作需要通過回憶來進行。

該書的敘述方式不但是一種極有意義的言語方式，也是一種可行的哲學性的言語方式，它沒有哲學思辨的外衣，卻能通過情緒帶動人的思考。這是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模式，這是在流俗哲學觀念之外的哲學。

便再回到中國人的『種』或『性』那裏去尋找；於是循環一圈，又回到追求變法，必先變人，如何變人，不外從人主以身作則，修齊治平開始的老路上去。倒真是當代『非無法治之患，實無人心之患』的現實，才使得我們真正意識到了捨此循環，再無出路的處境。」（陳家琪：《話語的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125-27，以下簡稱《話語》。）

句型、文化、語言，以及各種各樣在其間循環往復的新舊理論，導致的結果是甚麼呢？首先自然是語言與理論均被工具化：

於是語言真的成為了可供人隨心所欲像手榴彈、迫擊炮一樣使用的工具，大家都明白了就思想與語言的關係而論，只有思想（動機，現實效益）才是目的，而且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惜採取任何手段（語言）。語言（手段）之外的思想（目的），除了「陰謀」、「陽謀」之類的東西外還能是甚麼呢？為了明天，今天的一切都在所不惜的結果，倒可能真的只剩下了今天。這一點致命地深化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劣根性，重鑄了差不多可以說是幾代人的不幸性格，致使在這種話語方式下的任何民族精神或人文理想的重建都無法擺脫「不過手段」的陰影，也談不上個人道德責任感上的承擔與確信。（《話語》，頁308-309）

其次是理論的繁雜與混亂，以及其背後理想世界的失落。「當代」

成為了「一個各說各的時代。共同的標準是虛假的，而真實的標準又無法提出來，所以只有各說各。這種黑暗中的各說各消耗着我們民族有識之士的心血，就像遼闊大海上那一盞盞永不熄滅而又永遠起不到導航作用的航標一樣」（《人生》，頁147）。『舊籬已去，新牆未築』，『舊籬』真的已去，『新牆』真的待築嗎？『當代』瀰漫於我們四周，我們無從看清，但又無可逃遁；更多的人看到的是這樣一種瀰漫使思想建築物一批一批的倒塌，所以才急於『築牆』，而我卻必須通過清理使倒塌後的地基更其顯露，就是說，讓『舊籬』真的已去，且要說明『舊籬』是在怎樣的地基上建構起來的。」（《話語》，頁124）

以上的分析，筆者是從《三十年》的閱讀中，通過直觀地感受作者當時當地的情緒性體驗，才生發出來的。如若它不是一種體驗，那它本身又有可能墜入語言的深淵，淹沒在一大堆喧囂的理論之中。其中的嚴酷性與重要性，就不可能使得我們時時警醒。而這種回憶卻能使得所有的這些——包括經驗、情緒、知識、認識——統攝在一種情緒性的體驗之中，能夠被整體地感覺到。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既不同於簡單的回憶，也不同於傳統的哲學思辨，這是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模式，這是在流俗哲學觀念之外的哲學。

這種哲學的關鍵點，就在於「情緒性體驗」。情緒性體驗是回憶的結果，也是回憶的對象。情緒性

體驗作為一個整體，是一種情緒氛圍。這種情緒氛圍是思考整體意義的基礎和背景，只有在這種情緒氛圍下，才能有效抵制固有句型、文化、語言，以及各種新舊理論的侵蝕；才能真正釐清思想的線路，找到話語表達的可能。

陳先生一直以來十分重視「氣氛」這個概念，他曾寫道：

甲午戰爭過去一百年了，二戰過去五十年了，文革也快到三十年祭了。我們可曾有甚麼傳世作品留了下來，無論是理論性的見解還是文學藝術的作品。不要說創作的激情，恐怕就連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紀念活動也搞不起來了，因為缺少一種氣氛。說到這裏，我最欣賞德國總理科爾就戰爭結束五十年所發表的聲明中的一段話：所有這些回憶和感覺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們應當把這些當作各種人的生活經歷來尊重不去破壞它。我們應設法敞開心扉細心聆聽他們的聲音。這需要有回憶和沉思的氣氛。（《人生》，頁158）

只有通過回憶和沉思營造出這種氛圍，這一切才有可能。在日常語言被濫用，固定句型卻沒有任何變化的情況下，尤其當這種濫用被當作一種遊戲，而對於固定句型的來源都已經遺忘並不加思索地接受的情況下，如果能夠營造出這樣的氛圍，那絕對是彌足珍貴的。

如此閱讀並接近《三十年》一書，我們就會意識到，該書的敘述方式不但是一種極有意義的言語方

式，也是一種可行的哲學性的言語方式，它沒有哲學思辨的外衣，卻能通過情緒帶動人的思考；它剔去了回憶中的濫情，沒有將回憶變成一種自我的憐憫與炫耀，同時它又設置了一道閱讀的門檻，讀者必須對人生有所體悟，對哲學有所洞察，才能進入這一特殊的哲學言說方式。如果缺少這一踏入門檻的能力，也極易將其讀成簡單的回憶，而不會去注意其深層的哲思。

筆者從陳先生那裏了解到，這本書已經打開了記憶之門，使得那些經歷過同樣歲月的讀者，都感到有許許多多的話要說、想說、不得不說，從而也就為營造一個整體的氛圍提供了可能，雖然這種可能是很微弱的。陳先生對我們這些後生期望很高，卻又非常寬容。他知道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因此常常會有意識地通過講述這些往事，來激發那些真正富有建構性的哲思。他說：

我注重個人的或稱之為偶然的東西，相信所謂的理解和溝通，甚至就是自己親手寫下的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係，也基本不是因果的而是領悟的。要在流逝中把自己的感受凝固下來，就需要時時反思自己的心境。由心境至心態，以求能夠描述出我們這代人對於死亡、不確定性和他人之存在的整體性感受方式；因為只有這種感受才是思想的萌生的原初形態，才真正瀰漫着叔本華所說的那種極富意味的哲學情緒。（陳家琪：《浪漫與幽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71。）

《三十年》剔去了回憶中的濫情，沒有將回憶變成一種自我的憐憫與炫耀，同時它又設置了一道閱讀的門檻，讀者必須對哲學有所洞察，才能進入這一特殊的哲學言說方式。